德　国

从总体上看，2016 年德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本延续了近年来的讨论主题。2016 年，德国处于多事之秋，如难民问题尖锐化、右翼势力崛起、民粹主义膨胀等，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却持续进行。这些问题被视为老问题的新变种，即资本主义剥削中的反弹现象。不过，在资本主义批判的基调中，也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即对未来社会的积极构想。与左翼学者往往多数只给出诊断而不给出药方不同，2016 年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在继续批判资本主义的扭曲发展时，还给出了未来社会的积极构想。因此，本报告在讨论德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础上，在继续关注资本主义批判的同时，也将勾勒未来社会的构想。

一、学术与实践活动中的马克思

（一）MEGA^2 编辑出版新动向

德国公共科学会议（GWK）于 2015 年 10 月 30 日通过决议，决定继续资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的编纂工作，资助期限为 16 年。就如 G. 弗勒贝尔特（Georg Fülberth）所言，得到这样资助并非理

所当然。[①] 一方面，人文科学的资助金额是短缺的，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申请者必须相互竞争有限的名额。所谓的长期研究计划越来越处于这种不利主张的压力之下，即它阻碍了那些声称能够带来创新的新申请者。例如，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格林词典的编纂项目，它虽然作为一个享有声望的研究计划不可撼动，但是继续编纂计划还是遭到否定，无法继续获得资助。MEGA^{2}的编纂出版尤其受到质疑：它进展缓慢、耗时耗力，随着现今数字化的发展，人们甚至怀疑它的印刷出版是否还有意义。实际上，这次 MEGA^2 不是作为一个继续研究计划，而是作为一个新的研究计划，即以新的申报题目“新构想并符合 21 世纪接受习惯形式中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才获得了通过。

G. 弗勒贝尔特认为，这次会议标志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编纂工作进入了第四个时期。前三个时期分别是：第一个时期（MEGA^1）由 D. 梁赞诺夫主持，始于 1927 年，终结于斯大林时期 20 世纪 30 年代。第二个时期（MEGA^2）从 1975 年持续到 1990 年。第三个时期，始于 1990 年之后对 MEGA^2 的拯救、重新规划和推进。那么，为什么这次会议标志着新时期的开始呢？主要原因是这次会议确定了 MEGA^2 今后的数字化出版方向。

众所周知，MEGA^2 由四大部分构成。第一部分包括所有马克思恩格斯生前发表的（《资本论》除外）著作、文章、草稿。截至 2016 年底，计划中的 32 卷已有 22 卷出版，所缺卷数已经拟定出版。其中，包括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等。第二部分包括《资本论》及其准备稿 15 卷，2012 年已经出齐。其中，有些可在网上查阅。[②] 第三部分主要包括马克思恩格斯自己和寄给他们的全部书信。截至 2016 年底，计划中的 35 卷仅仅出版了 14 卷。其中，前 13 卷涵盖了从开始到 1865 年 12 月的时间段，之后的很长时间段目前仍付之阙如；接下来的第 30 卷涵盖了 1889 年 10 月 1 日到 1890 年 11 月 30 日之间的书信往来。剩余的 21 卷不再印刷出版，而只出电子版。第四部分主要包括摘录、笔记、旁注，至今只出版了计划出版

---

① Georg Fülberth, Neues von der MEGA, in: *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 Nr.105, 2016, S.106.

② http：//telota.bbaw.de/mega。主要包括：《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资本论》（1863—1865 年经济学手稿）；《资本论》第 1 卷，1867 年汉堡版；《资本论》第 2 卷手稿 1868—1881；恩格斯 1884/1885 年编辑的《资本论》第 2 卷、1885 年版《资本论》第 2 卷；1894 年版《资本论》第 3 卷。

32 卷中的 14 卷，剩余的大部分卷次也都将只出电子版。在将来，不仅这些即将出版的电子版卷数对公众开放，之前的出版物将会被扫描成电子版上传到网上，也对公众开放。

（二）马克思的革命概念

自 2008 年起，“马克思—秋季学校”已走过了八个年头。为了承接与深化之前的讨论主题，“马克思—秋季学校”第九期（2016 年 11 月 4—6 日）讨论的主题是马克思的革命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它也是为了准备纪念俄国十月革命一百周年的“理论预热”。参与这次讨论的学者有 R. 莫尔（Renate Mohl）、N. 拉科维茨（Nadja Rakowitz）和 C. 弗林斯（Christian Frings）。在马克思那里，革命概念包含着两个紧密相关的方面：（1）马克思早年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的、并贯穿其一生的绝对命令，即“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该命令被视为社会转型和革命的目的。（2）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中，一种至少是科学意义上的革命概念被鲜明地提了出来。因此，克服资本主义的革命要求和对资本主义关系作出科学描述的要求在马克思那里是密不可分的。这两个方面在《资本论》中得到了有效地融合。一方面，该著作与资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理解（包括当时的经济学理论）分道扬镳；另一方面它试图解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可变性和从这种生产关系中产生出来另一个社会的必然性，当然首先要规定它的内在矛盾、动力、危机性。

然而，在马克思那里并没有统一的革命概念。马克思同样处理了政治革命、科技革命，也研究了即将到来的社会革命。今年的秋季学校主要处理马克思走向政治—经济革命的阶段。以 1848 年革命为中心，马克思对革命问题的讨论可以被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是 1848 年以前——在 1848 年以前的文本中，马克思阐发了政治革命的概念，同时也区分了资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第二时期是 1848 年革命时期——在 1848 年革命时期的文本中，马克思主要讨论了席卷全世界的革命发展和时代断裂问题。第三时期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时期——在这些文本中，马克思在科学地界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程中寻找革命的可能性。①

除了讨论这些文本之外，法国的 A. 比恩鲍姆（Antonia Birnbaum）做了

① 选读的文本可在该网站下载：http://marxherbstschule.net/10/?page_id=758。

题为《政治的马克思，以及对抗与共产主义的一致性》的演讲；美国的 M. 罗特以《否认有机的—自然的过程或者革命的过程》为题，阐述了 B. 布莱希特的革命概念。

（三）资本主义与移民问题

有 50 多人参与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周”（2016 年 3 月 14—18 日，法兰克福）讨论了时下最为棘手的欧洲难民危机问题。许多学术报告主要分析了今天和历史上的难民潮起因，资本主义生产条件和移民的普遍关联，以及阶级的重要性等。在开场报告中，德国政治学家 F. 德佩阐述了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与自由劳动力储备军即相对人口过剩之间的关系，指出移民与城市化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他强调，在与当下难民起因的斗争中——它的历史根源同样根植于殖民剥削和当今的新殖民关系，必须在当地的社会革命中建立起符合人的尊严的生存条件。在这里，F. 德佩提出了一个得到广泛讨论的问题，即如何能把亨廷顿以来所鼓吹的文化斗争再次转变为阶级斗争。德国经济学家 E. 阿尔特法特（Elmar Altvater）讨论了全球资本主义矛盾和移民问题。他认为，资本积累必然导致无产者走向贫困化，这种贫困化在全球发展落差和最终的难民潮中达到顶峰。此外，他也指出了环境灾难所引起的难民潮。他强调，为了在世界范围内遏制金融市场在社会经济方面对生活条件的负面影响，把金融市场重新嵌入到制度框架中将是一个有意义的前期目标。不过，在改变社会生态和经济所需要的可能主体方面存在着论争。E. 阿尔特法特认为，难民的困难处境使进一步的政治参与不再可能。J. 哈代（Jane Hardy）的报告首先描绘了 19 至 20 世纪的欧洲移民运动。从 1870 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总共有 500 万左右欧洲人迁徙到北美与南美洲等地，其中有大量贫穷与流离失所的小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移民潮发生逆向流动。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重振需要大量劳动力，英国、法国和荷兰从它们曾经的殖民地地区招募了大量劳工，而其他国家则从紧邻欧洲的南部边缘地区，如土耳其和北非招募工人。截至 1973 年，移民劳动力占据法国和德国整个国家劳动力的 10%。移民工人作为廉价劳动力与当地工人之间的矛盾早已存在，并非最近才发生。J. 哈代指出，针对社会的断裂，只有通过工会组织好诸多移民，并且在共同的罢工中，阶级团结才能建立起来。

另外，值得一提的报告，是关于难民起因和对之斗争的讨论。B. 马班察（Boniface Mabanza）阐述了北方国家与非洲国家之间的新殖民关系，例如结构

上的适应方案、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他认为，真正的“入侵”并非是那些涌入欧洲的难民们，而且几个世纪以来的欧洲殖民者。当今非洲联盟虽然立场鲜明地反对这种殖民形式的剥削，但在金融和制度方面仅是微弱地表达了这种立场。随着更多国家如中国的参与，它们提供了更多合作的可能性。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弱化剥削关系。① 在小组讨论环节中，以《马克思主义创新杂志》第105 期中“资本主义与移民”一栏中的文章为基础，与会者分为三个小组分别讨论了“政治经济学和移民”、“难民的起因”、“作为阶级问题的移民”问题。

（四）反对种族主义运动

2016 年 3 月 13 日，德国巴登-符腾堡州、莱茵兰-法拉茨州和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举行了州议会选举，出人意料的是，“德国另一种选择党”（简称AfD）在该三州的选举中均斩获两位数的战果，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选票甚至超过 24%，位列该州第二。此后有超过 17000 人签名支持“反对种族主义”运动的呼吁。2016 年 4 月 23 日，来自左翼组织、反种族主义活跃分子和工会成员等超过 600 人，参加了在法兰克福召开的反对“德国另一种选择党”运动的行动大会。会议主题是讨论如何让这场运动有效地转化为实际行动，这已经不再是关于“什么是 AfD？”的问题了，而是更多地关于怎样反对它。德国社会学家 A. 肯佩尔（Andreas Kemper）与黑森州穆斯林核心小组成员 S. 巴尔坎（Said Barkan）、被纳粹政权迫害者联盟代表 C. 克尔特（Cornalie Kerth）、“我的权利就是你的权利联盟”代表 S. 乌拉（Samee Ullah），在周末晚上的开场讲坛中宣称“这被是一个值得肯定的发展”。S. 乌拉和 S. 巴尔坎的出席，不仅是政治上的联盟伙伴出席，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德国另一种选择党”崛起威胁的少数派代表。S. 乌拉指出了一些反对难民们参与的特殊困难。例如，国家层面的歧视、难民营无法上网，以及常常缺少组织交流的可能性。S. 巴尔坎清楚阐述了反穆斯林的种族主义与其他歧视形式的关联，并强调核心小组反对种族主义，同时反对性别歧视、反对反穆斯林主义。

在德国五金工会全权代表 M. 埃哈特和黑森州博物馆总部董事会成员 O. 阿克佐伊致辞后，周末开始了行动会议的积极筹办事宜。在各种工作坊中，参与者们讨论了开展运动的核心因素，如如何在柏林的众议院选举前夕有效组织

---

① 参见 Boniface Mabanza Bambu，Fluchtursachen bekämpfen：Was ist damit gemeint? *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Nr.105, 2016, S.67-76。

“周末行动”。在此，“封锁占领”（Blockupy）和干预主义左翼提出了他们的支持。大会上也成立了专门工作小组，例如，收集“德国另一种选择党”全体成员和工作人员信息小组、创作该运动和同盟成员能够被广泛知晓的公众材料的工作组。另外，专门研究所谓的“固定餐桌斗争者”（Stammtischkämpfer）的工作坊也得到了积极的响应。上述想法和做法是基于这个事实，即“德国另一种选择党”是社会力量关系向右翼偏移的表达，它首先发生在所有的社会领域，然后发生在大多数人直接的周围环境中。针对这个事实，一个训练模式将会被发展，它主要帮助人们克服在反对右翼立场时的失语状态。在此，“固定餐桌”象征性地为游乐场提供长凳，为超市提供收银台或者为银婚纪念日提供咖啡桌。该工作坊的第二阶段主要涉及与“德国另一种选择党”正面遭遇的各个领域。例如，学生在“脸书”（Facebook）上有组织地交流，在社区内部利用已有的社区活动进行网络化组织等等。大会之后，运动的组织者很快落实建立了自己的网站。①

二、马克思的资本循环理论

众所周知，在《资本论》第 2 卷中，马克思集中考察了资本的流通过程，以及由此产生的区分与规定性。马克思的论述是从三种不同形态的资本循环开始的：货币（G）、生产（P）和商品（W）。马克思排除了资本作为固定物或不变关系的可能性，他认为资本总是从一种形态转化为另一种形态：从货币资本到生产资本，从生产资本到商品资本。产业资本有三种形态，因而资本循环也有三种形式，即货币资本循环（G—W…P…W′—G′）、生产资本循环（P…W′—G′—W…P）、商品资本循环（W′—G′—W…P…W′）。这三种循环形式不是独立的，而是处于产业资本的无限循环之中。资本构成了生产与流通的统一体，它从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的转化被马克思称为“资本的形态变化”（Metamorphosendes Kapitals）。这种论述的关键视角不是追溯生产过程中资本形成的起源，而是生产仅仅构成了资本在其循环中的一个阶段或形态。虽然马克思区分了生产过程中“资本的真实形态变化”和“流通的形式形态变化”，但它们是资本在其生产过程中所具有的全部阶段。即便如此，马克思仍然区分

① https://www.aufstehen-gegen-rassismus.de.

了循环的三种类型：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在该卷第一篇中，马克思详细分析了每种形式的资本循环过程，不过他又总结性地认为这三种循环的特征仅仅是一种形式的区分，因为每一种循环都预设并包含了其他循环，“整个区分仅仅是形式的，或者同时是作为主观的，为观察者而存在的区分。”[①] 在 MEGA^2 中，编辑指出马克思曾经详细解释了这三种资本循环并多次重新撰写，但最终并未形成定稿。由此产生的问题是，马克思为什么如此耗费精力，最后却只指出它们的区分仅仅是形式的和主观的？在这些形式的区分中，它们的真实的和客观的差别又存在何处？

在《资本的三种循环与真实差别》[②] 一文中，A. 佩希曼尝试把资本循环的三种形式当作真实的区别来理解，由此阐明每种循环过程中所产生的真实问题。虽然每种资本循环形式在循环运动中都以其他循环为前提，但从客观上看，每种循环在内容和目的上都有差异。在货币资本中，循环的目的是价值增殖（G…G′），在生产资本中则是重新生产被使用过的生产资本（P…P），在商品资本中是更新被消费的商品（W′…W′）。因而，A. 佩希曼认为，根据资本流通中存在的这些真实差别包含的不同问题、困难和危机现象，能够解释人们看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同视角及其不同理解。

首先，货币资本循环过程是货币—商品……生产……商品′—货币′，用字母表示就是 G—W…P…W′—G′ -etc. 与其他两种循环形式相比，该循环的特征是：（1）赚取货币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明显的推动力量，因为循环的出发点和终结点都是货币；（2）生产过程仅仅是作为预付价值增殖的工具；（3）在 G…G′ 过程，货币中的价值增殖似乎成为独立的价值形式，似乎货币资本能够“钱生钱”，而生产过程仅仅是“为了生钱目的而存在的必要麻烦”。货币资本循环中所呈现出的“钱生钱”的假象，被某些资产阶级理论家视为真实的过程。例如重商主义就遵循货币资本逻辑，主张经济活动的目的就是增加以货币形式存在的财富。这种价值增加的根源不是来自于生产领域，而是源自于商品流通领域，即商业交易。若将这种思维运用到国际贸易中去，就是一国要在国际贸易中增加国内货币财富，就必须使得贸易的最终结果是出口额大于进口额，只有这样才会赚取更多的货币财富。虽然重商主义只盛行于 17、18

① Marx-Engels-Werke, Band24, Der Zirkulationsprozess des Kapitals, Berlin 1971, S.105.

② Alexander von Pechmann: Die drei Kreislaeufe des Kapitals und ihre realen Unterschiede. In:*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 Nr.105,2016.

世纪，但它在当代也找到了代表，即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一些人认为金融服务业本身就能创造社会财富，因此金融服务业能够使得货币资本不断地增殖。相比商品交易，金融交易被认为更具优势，因为它省去了必要的现实交易麻烦，这里资本的运动呈现为纯粹的“钱生钱”形式。在《资本论》第 2 卷中，马克思仅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观点，并未批判金融资本的问题；但在《资本论》第 3 卷中则处理了生息资本问题。货币资本的逻辑不仅受到金融市场和其理论家们的追捧，而且也被那些对之进行批判的人不自觉地追随着。例如，有一种批判就是从伦理道德角度指责货币资本“钱生钱”的目的。在此批判框架中，追逐利润被视作狭义上的金融业或者广义上的资本主义的主要推动力量。但由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其他功能就被忽略了，资本主义就被等同于发财致富的体系。

A. 佩希曼认为更重要的是，根据马克思对货币资本流通过程的分析而产生的批判方式。根据该分析，货币资本的增殖目的并非能够直接地实现，它必须通过一系列中介环节，即货币形式的资本必须转化为作为劳动力和生产工具的生产资本，因为剩余价值只有在生产过程中才会形成。因此，货币资本的增殖仅仅是对未支付报酬的剩余劳动的占有，也就是说，资本的价值增殖通过剥削劳动而发生。因此，对货币增殖的批判应当最终落脚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但是，这种批判方式又产生了下述问题，即：为什么工人阶级甘于受剥削呢？为什么工人阶级会有生产与再生产这种关系，从而使得并保障不断地通过资本和货币资本循环而占有剩余价值成为可能？在过去 100 年里，正是这个问题推动了有关意识形态批判的研究，即研究占支配地位的权力关系或者研究统治阶级的阐释模式对劳动者意识的影响。此外，它也推动了人们借助于社会心理学工具（适应与自我异化的机制）解释持续的剥削事实。然而，这种解释路径是一种外在的解释，即通过外在于经济的因素澄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存续。与这种解释模式相反，A. 佩希曼强调更有意义的是分析资本的其他循环形式。①

其次，生产资本循环是资本的第二种变化形态。与货币资本不同，生产资本并非从作为抽象一般的价值形式的货币开始，而是从生产要素的材料具体

① Alexander von Pechmann: Die drei Kreislaeufe des Kapitals und ihre realen Unterschiede. In:*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 Nr.105,2016, S.116-117.

形态，即劳动力（Ak）和生产资料（Pm）开始。它们之所以是生产资本，是因为一方面劳动力具有商品的形式，它由资本家通过支付劳动者工资的方式购买而来，另一方面生产要素以一定方式和程度是既定的，劳动过程同时也是增殖过程。生产资本的功能在于它在生产过程中能够被使用，随着产品的生产，生产要素被消耗掉。因此，生产资本循环就在于借助流通领域，即出卖作为商品的产品（W′—G′）并且重新购买生产要素（G—W），重新生产在其开始的生产形态中的资本。显而易见，这种形态变化的目的是更新生产资本，用公式表示就是：P…W′—G′—W…P。

应该强调的是，在此描述中，马克思所关注的是生产资本循环的资本主义特征。流通和货币在此构成了中间环节和中心，它促成了生产资本的再生产。从中也可以看出，生产资本的形态变化（W′—G′—W）同时构成了整个社会商品流通（W—G—W）的一部分。在第一个形态变化中，生产的商品在转化为货币资本（W′—G′）时必须证明是对社会有用的使用价值。在第二个形态变化中，货币转化为生产资本（G—W）一方面构成了作为工人劳动收入的工资形式，另一方面把生产资料的产品转化成了货币形式（W′—G′）。在这里，A. 佩希曼考察了生产资本循环受到阻碍的情况：一种情况是生产的产品无法寻找到相应的或者足够的购买者，这就构成了马克思所谓的“生产过剩”或“消费不足”；另一种情况是第二阶段的货币没有转化成生产资本，而是转化成为生息资本。这两种情况之所以应当受到特别关注，主要原因在于，它们在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中被排除在外，仅仅被当作市场过程要么被垄断要么被工会扭曲的结果。此外，揭示生产资本循环过程，也能够从经济角度回答为什么工人会再生产剥削的条件，即“提供与保证工作岗位，是作为生产力和生活再生产的保障”。①

最后，商品资本循环开始于出卖所生产的商品（W′），完成于对商品的更新，该循环的公式是：W′—G′—W…P…W′。很明显，这个循环的意义和目的就是再生产消费产品。但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循环的目的同时掺杂着其他目的，因为商品并非仅具有使用价值，也具有价值，它同时也是剩余价值的载体。所以，商品一方面是满足购买者需求的物，另一方面对销售者来说它

① Alexander von Pechmann: Die drei Kreislaeufe des Kapitals und ihre realen Unterschiede. In:*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 Nr.105,2016, S.123.

是表现在商品形式中的增殖资本。在此，马克思强调两点：(1）这里不是价值应当增殖，而是开始于以商品形式体现的已经增殖的资本价值，循环的结束也是体现在商品形式中的已经增殖的资本（W′…W′）。(2）商品资本包括流通和生产领域，运动的目的在于资本更新为商品形式，即能够满足社会需要的具有使用价值的商品形式。

在这里，A. 佩希曼强调商品转化为货币的重要性，因为它关系到之后所有环节是否能够顺利进行。转化是否成功，关键在于消费者的消费欲望是否能被生产者和销售者唤醒。诸多因素构成了对消费欲望的刺激，它包括商品作为使用价值的有用性、商品的美学吸引力，以及新产品的创新等。商品被如此地塑造，它不仅是为满足购买者的特定需求，同时也展现为一种吸引人的生活方式，消费者通过购买能够参与其中的生活方式。当然，马克思并没有对此进行过系统研究，A. 佩希曼认为 W.F. 豪克的《商品美学批判》填补了这方面的不足。① 在 W.F. 豪克那里，商品作为有用的物已转化成具有“美学使用价值承诺”的物，美学的假象在当今比商品本身的存在更为重要。不过，尽管 W.F. 豪克的商品美学批判充满许多真知灼见，但他把制造假象的动力诉之于资本家赚取利润的欲望则过于简单，从而错过了对价值形态转化的分析。这种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中介的需求结构，被新的心理分析思想所研究，如拉康、德勒兹、瓜塔利等人。他们不是从生产者和销售者的视角，而是从消费者的视角出发分析作为象征秩序的商品，探求与此相关联的心理结构，阐发“欲望辩证法”等解释模型。

通过以上分析，A. 佩希曼强调，不能依靠一个维度去确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而是要从多重维度理解资本的本质，“在固定的区分中同时把握统一性，并且与之相反，也要把握这种统一性的必然区分。”② 某种相同的生产方式既包括在经济人效用和利润最大化的意义上的经济维度，也包括在政治经济语境中的生产和社会维度，还有需求满足的心理维度。与资本循环相应的是，它们不仅是形式的差异同时也是真实的差异，伴随着这种差异形成了有关什么是资本主义不同的感知和理论构想。

---

① Wolfgang Fritz Haug:*Kritikder Warenaesthetik*, Frankfurt/Main,1972.

② Alexander von Pechmann: Die drei Kreislaeufe des Kapitals und ihre realen Unterschiede. In:*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 Nr.105,2016, S.129.

三、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的完善与发展

2011 年霍耐特出版了大部头著作《自由的权利——民主伦理大纲》，该书虽然旨在复兴黑格尔主义传统的伦理学，但也激起了人们对马克思法哲学批判的兴趣。2015 年，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批判理论家 Ch. 门克（Christoph Menke）又出版了一部大部头著作《权利批判》，该书是继霍耐特《自由的权利》之后又一部实践哲学力作。与传统实践哲学不同，该书并未直接探讨自由权利、社会正义、国家主权等重要议题，而是通过分析整个资产阶级传统中关于权利的理解与批判，试图阐发出一种新的权利学说。① 从表面看来，这似乎是一本不合时宜的书。难道世界不仍然充满着对权利的无视和践踏吗？相比批判各种公民权利，捍卫各种权利不是更迫切吗？面对当今频发的人道主义灾难、难民危机等，通过国家间合作，坚决贯彻各项已成文的人权规范不正是当务之急吗？现实的世界似乎不是权利的过度使用或误用，而是权利的缺少。该书并不否认这一直觉判断，它旨在探明这种缺少本身恰恰是资产阶级的权利形式导致的，“自由主义无法理解，正是资产阶级的权利形式把政治贬低为警治并产生了社会的‘事实不平等’，也无法理解它是怎样做到的。”② 面对现实权利的缺乏，自由主义只能以善良意图对之进行指责。Ch. 门克认为这种批判是外在的，它只是把现存的要求与合理的要求相比较，并未阐明资产阶级的权利形式怎样产生了该结果。借鉴马克思的批判方法，即真正的批判要表明它所批判的事物的内在起源，Ch. 门克主张对资产阶级的权利形式之谱系学分析不仅能够揭示它内在的矛盾，而且能够使得一种新的权利成为可能。

Ch. 门克指出，早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就已经强调资产阶级对权利的主张是神秘的。这具体体现在，一方面资产阶级革命对个体权利的宣称是一种政治行为，在此行为中诞生了一个反对传统统治秩序的政治共同体；另一方面这种政治上所主张的权利授予了资产阶级社会中的非政治个体，这使得政治共同体服务于“脱离了他人与共同体的自私自利的个人”。资产阶

---

① 德语中的“Recht”可以译为法（law）与权利（right），在《权利批判》中，当作者用 Recht 指代法（law）时，他常用定冠词“das Recht”，用它指代权利（right）时，则用不定冠词“ein Recht”或复数“Rechte”。

② Christoph Menke, *Kritikder Rechte*, Berlin: Suhrkamp,2015, S.11.

级对平等权利的主张之神秘性就在于，“赋予非政治的人以权利的政治行为，并因此是政治的自我剥夺。”① 马克思认为这种神秘性很容易被揭穿，解决办法就是“政治革命就是资产阶级社会革命”。很明显，马克思是从资产阶级革命的后果去解释它的谜一般的特性，即资产阶级社会从政治中解放出来，政治沦为服务它的工具。Ch. 门克认为这种从后果角度的解释过于简单，因为问题的关键首先不在于它为什么降低政治，而是在于它怎样通过主张权利做到的，如果不理解它怎样做到的，那么我们便无法在内容、目的和效果方面理解资产阶级对平等权利的主张。事实上，权利的“如何”优先于它的“什么”、“为什么”和“为什么目的”。这个“如何”的处理方式就是权利的形式。该书就是通过对现代权利形式的分析，进一步完善和发展马克思曾经所进行的法哲学批判。

Ch. 门克主张，现代法所确立的平等权利是一种特殊的和完全新型的规范机制，是“一种本体论变革”。他区分了三种形式的法，雅典法、罗马法、现代法。前两种法在对法的功能界定方面虽有很大不同，但在对权利的理解上是相同的，“在雅典法和罗马法中，合法的权利诉求是一个正义诉求，因为它要求某种‘正义的东西’（Gerechtes）：要求一种通过人与人之间正义的分配和平衡而确定的占有。”② 正义的分配与某个人在共同体中的伦理地位相关，这种地位的差别决定了分配的差异。然而，在现代法中，权利的要求并不涉及某种正义的东西，而是“涉及先于或外在于法的东西：涉及实施某个行为的权利或自由，它独立于法或先于法而存在”③ 。就是说，现代法所确立的内容与法本身不相关，这些内容是纯粹的自然因素，是人们自由实施个人行为或满足个体不同欲望的要求。当然，这些自然的事实并非本身就具有规范性，而是在一定的外在限制条件下，才能成为合法的权利诉求。这个外在的限制条件，就是相互不影响各自自由的任意行为，“权利诉求的规范力量不再源自于内容，即它是什么，而是源自于何种程度或者多少。”④ 这种外在的限定所遵循的原则就是康德所界定的：“任何一个行动都是合法的，当它或者按其准则每个人的任性的自

① Christoph Menke, *Kritikder Rechte*, Berlin: Suhrkamp,2015, S.8.
② Christoph Menke, *Kritikder Rechte*, Berlin: Suhrkamp,2015, S.57.
③ Christoph Menke, *Kritikder Rechte*, Berlin: Suhrkamp,2015, S.57.
④ Christoph Menke, *Kritikder Rechte*, Berlin: Suhrkamp,2015, S.59.

由，都能够根据一个普遍法则与任何人的自由共存。”[①] 任何行为只要符合这种外在的限定就是合法的，至于它本身则可不受任何内在规范的约束。对于法来说，它们是完全不受规定的。由此，现代的权利诉求使得规范性与事实性紧密糅合在一起，这种权利诉求对他人来说是一种具有规范约束力的要求，但这种规范性恰恰在于产生先于规范或外在于规范的事实性，简言之，现代“权利产生的形式就是合法化自然的东西”[②]。

该书第一章除了界定现代法与雅典法、罗马法的区别之外，也具体分析了现代法的形式化过程。现代法通过两种方式使得对权利的要求合法化：“使能够”（Ermöglichung）和“允许”（Erlaubnis）。前者涉及为什么使用权利，涉及法与使用权利的行为之间的关系，法使得自然的要求能够实现。后者涉及为什么要遵守法律义务，涉及法与法律上所确定的权利的理由之间的关系，法允许意欲自然的癖好。权利的现代形式的实施就是对这种自然东西的合法化过程。权利的现代理论在 19 世纪形成了两种基本设想，这两种对立的设想直到 20 世纪仍然被广泛地讨论：一是利益理论，一是意志或任意理论。利益理论主要阐明了权利的“使能够”方面，即所有权利主要在于使得自然追求得到平等实现，这种最基本的追求就是利益。与之相对，意志理论强调所有权利在于保障自然追求的领域。不过，虽然这两个方面相互补充，但也相互对立。使利益的实现成为可能，预设法规定了自然的欲求，而允许任意则预设自然的欲求对法来说是无规定的。[③] Ch. 门克认为，它们相互补充构成了现代法的整体，同时又相互对立。这种矛盾的关系构成了权利的现代形式。

该书第二章从概念层面进一步分析现代法，认为权利的现代形式扭曲了作为自我反思的现代法，它是法的自我反思的障碍。首先，借助卢曼对法的形式的分析，Ch. 门克澄清了现代法立法过程中的神秘性。现代法的“合法律性”（Legalität）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自主性，即法的设立是自主的，它不依赖于伦理或自然法，法自己产生它的规范性，不需要考虑政治伦理或者自然理性；另一方面自主的法是有关权利的法，合法化的过程不是从无创造有，而是从既定的事实，从先于法存在的东西出发使之合法化的过程。由此可见，法

---

① 《康德著作全集》第 6 卷，张荣、李秋零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38 页。（译文有改动）

② Christoph Menke, *Kritikder Rechte*, Berlin: Suhrkamp,2015, S.63.

③ Christoph Menke, *Kritikder Rechte*, Berlin: Suhrkamp,2015, S.97.

的规范性也就预设了它不能处置的事实性。立法的同时也是对法的限定，创立和限制是合法律性的一体两面，“近代的合法律性理念的神秘性在于，怎样一起思考立法（主权）的自主性与对先于法的东西的（材料）的考虑。”① 利用卢曼对法的形式的分析，Ch. 门克从理论角度阐释了广义的法所包含的内在漏洞。任何法都包含了两种意义上的区分，一种是区分法与不法（Unrecht），另一种是区分法与“无法”（Nichtrecht）。前者的区分如伦理学中的“善”与“恶”的区分一样，是属于法本身之内的区分，只有存在这种区分，才会存在法。后一种区分借鉴的是系统论学说，即任何系统都存在与之相区分的世界，该世界构成了系统的“环境”（Umwelt）。法与无法的区分，就是作为法的系统与该系统之外的世界的区分，通过这种区分，法与无法能够自我指涉。当然，这两种区分不是完全分离的。外部世界通过法与不法的区分而建立起来。法与无法的区分不是在法中区分了法与不法，由此这种区分不是无法转化成法的东西，而是无法被带入法之中，但法又不能对之作出法与不法的区分，所以它是作为法的他者而存在，是“无法”，既不是法，又不是不法。其次，Ch. 门克指出广义上法的漏洞在传统法中是不存在的，因为该漏洞被传统的目的论或客观理性弥合了，但现代法并未外在地弥合该漏洞，而是使之成为反思的对象，现代法的自我反思就是“这样的步骤，在此法只有如此自我指涉才会出现在法中……即它在与无法的区分中自我指涉或指涉作为法的他者的无法”② 。现代法的这种自我反思过程，又被称为“形式的物质化”，即无法作为自然的东西在法中起到了作用，因为法不能够对之作出任何规定，但是法又必须使其自身与之区分开来，否定它法则不能够自我指涉。最后，权利的现代形式就是现代法自我反思的产物，是现代法自我反思的形式，是它所表现出来的现象。但是权利的现代形式实际存在的形态，即资产阶级法，却是这种自我反思的障碍，它并未显现本质，而是歪曲了本质。由于资产阶级法的基本规定是主观权利，资产阶级法是现代法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存在形式，因此主观权利的基础是法的现代自我反思。资产阶级的主观权利理论之所以是错误的法，是因为它既预设了法的自我反思同时又扭曲了这种自我反思。这个错误在于它是一种实证主义，即把法中作为无法的材料视为“既定物”（Gegebenen）。与之相对的是辩

① Christoph Menke, *Kritikder Rechte*, Berlin: Suhrkamp,2015, S.107.

② Christoph Menke, *Kritikder Rechte*, Berlin: Suhrkamp,2015, S.1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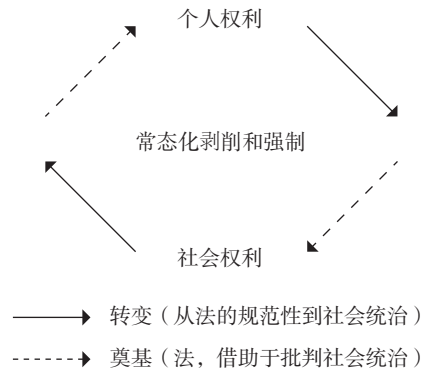
证唯物主义，即客体的优先性并非体现在它被视为最终的既定物，而是被视为处于中介中，被视为彻底无规定性，作为“否定的力量”。[①] 以此为基础的法就是与资产阶级法相对立的另一种法。

该书第三章进一步详细分析了资产阶级法的内在矛盾。首先通过考察耶利内克、萨维尼、M. 韦伯等对资产阶级个人权利的论述，阐明了资产阶级个人权利的许可原则并非没有添加任何能力和权力。主张个人权利的自由主义认为，法律仅仅是保障存在于法之前的个体的“物理”能力，这些能力是由自然赋予个体的，法律未添加任何能力。然而理论上并非如此，这些能力是现代资产阶级立法本身的产物，是法本身赋予了个体可以实现自身的任意自由。不是先有外在于法或前于法存在的主体性，然而再通过立法赋予主体性以权利，而是现代法产生了主体性，并使得主观的权利得以可能。所以，赋予个体以主观权利，同时是一种政治行为和私有化行为。政治行为是因为它判断何为法，私有化行为是因为它使得法仅仅成为保障实现私人意志的工具。对于私人意志本身，它不做任何内在的规范约束。它的唯一规范性源自于对私人意志的外在限定，即使得它们能相互不阻碍地共存。其次，Ch. 门克指出，对保障主观意志的实现，资产阶级法有着不同的理解。一方面，保障主观意志的实现被视为保障权利主体对自身意志的占有，这种占有构成了所有权的根据；另一方面主观意志的实现总是实现某种具体的目的，而目的的实现就需要具体的工具，因此主观意志需要私有财产以保障它的实现。但是作为工具的财产已超越了私人领域，它是社会的产物，因此它需要占有一定的社会产品，它就需要一定的社会权利。资产阶级法的批判就表现为这两种具体形态的斗争，前者表现为自由主义，后者表现为社会主义。它们的批判是一种意识形态批判，因为它们相互指责对方并非是自由的实现，而是社会统治的产物。主张个人权利的自由主义一方指责主张社会权利的社会主义会造成主体的常态化；而主张社会权利的社会主义一方则会指责对方背后隐藏的是剥削和压迫。双方为权利的正当解释而进行的斗争，也是政治斗争，是为争夺唯一解释权的斗争，它构成了资产阶级法的政治。这种斗争的过程，是资产阶级法的内在转化过程，作者用如下的示意图简要地介绍了这种斗争的过程[②]：

---

① Christoph Menke, *Kritikder Rechte*, Berlin: Suhrkamp,2015, S.170.

② Christoph Menke, *Kritikder Rechte*, Berlin: Suhrkamp,2015, S.304.



虽然相互批判能够使各自意识到自身的缺陷，但这种批判并不能超越资产阶级法，因为这种批判存在结构性的限制，即相互无法理解各自如何相互对立，以及各自转化为一种社会统治。借助于马克思的批判方法，Ch. 门克认为这种结果是资产阶级法的基础造成的，这个基础就是作为一种实证主义的主观权利的形式。

该书最后一章进一步指出了资产阶级法内在矛盾的根源，并且借助辩证唯物主义简要勾勒了另一种新的权利学说。Ch. 门克认为，主观权利形式的悖论根源于资产阶级政治的困境，它在当今体现为福利国家宪法的危机。这种危机使得政治与社会的关系被重新提出：一方面建立主观权利的政治行动在于保障资产阶级社会成为自主的联合体，但由于社会必然内在滋生权力统治，又需要持续地政治干预；另一方面政治干预仅在于保障主观权利的形式，它又再次产生自主的社会联合体，由于它内在滋生权力统治的倾向又需要持续地政治干预。由此可看出，以基本权利为基础的资产阶级政治是必然的，但同时又是无力的，它总是引发它欲解决的问题。① 通过重新解读尼采在《论道德的谱系》中阐述的奴隶起义，Ch. 门克指出主观权利的形式是现代奴隶起义的产物，该过程能够说明起义的奴隶为什么要求平等的权利，不过它也能指向另外一种可能形成新的权利诉求。这种新的权利形成奴隶起义中另外一种辩证的要求，该要求并非只主张权利只在于考虑奴隶的“无力”，即平等尊重所有人的意志，以此作为权利的最终根据，而是主张既要提供参与的权利，也要保障不参与的无力。

① Christoph Menke, *Kritikder Rechte*, Berlin: Suhrkamp,2015, S.325.

通过上文的简要勾勒，可以看出，Ch. 门克利用辩证唯物主义尝试批判资产阶级的主观权利形式，并试图给出另外一种权利学说的探索，无疑拓展与深化了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理论，也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四、德国左翼思潮变迁：从“改革的另外选择”到转型之争

在《马克思主义创新》杂志总第 107 期中，当今德国左翼广泛讨论的“转型”（Transformation）问题得到了专门的探讨。在转型研究之前，“改革的另外选择”（Reformalternative）问题曾在德国左翼中盛行了一段时间。左翼思潮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转变，这两者之间的差异究竟是什么？这期的四篇文章对此展开了深入地讨论。

1988 年，时任美因河畔法兰克福马克思主义研究所（IMSF）所长的 H. 荣格（Heinz Jung）与 J. 胡弗施密特（Jörg Huffschmid）共同出版了《改革的另外选择：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辩护》一书。① 该书出版的历史背景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代表戈尔巴乔夫改革方案和欧洲共产主义立场的德国共产党革新派，与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的民主德国立场以及“共产主义正统”所代表的力量之间产生了激烈争论。该书试图以所谓的“改革的另外选择”构想来调停这场争论，它主要是对 20 世纪末共产主义政治的理论与实践的不足进行批判性反思。当时的现实情况是，在 70 年代危机之后资本主义逐步走向稳定，而现实社会主义危机不但没有缓解，反而越来越严重，西欧的共产党也逐步走向衰落。70 年代以后，新社会运动集中关注基层民主、生态问题、核心力量、性别关系。工人运动的传统政党一开始便忽略这些新兴议题，他们的资本主义分析总是被框定在下述基本信念中，即 1917 年之后的世界已经处于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因而以微电子技术为基础的生产力革命也被长期低估。

“改革的另外选择”不仅脱离了教条的“时期概念”，即资本主义处于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也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工人运动中对改革与革命的区分。他们认为，传统观点低估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潜力，高估了现实社会主义的魅力。与此相反，人们必须准备适应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长期共存，就是说在发达

① Jörg Huffschmid/Heinz Jung, *Reformalternative. Ein marxistisches Plädoyer*. Arbeitsmaterialiendes IMSF28, Frankfurt/Main,1988.

资本主义国家长期不会过渡到社会主义。只有在资本主义的改革框架内，尖锐的人的问题才能得到解决。在“改革的另外选择”讨论中，H. 荣格与 J. 胡弗施密特坚持法兰克福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他们强调，在现代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一种在政治层面的社会和经济管制机制已经形成。”① 资本主义的具体形态将是政治和社会斗争的结果。因此，资本积累的速度和方向直到物质的结构都成为政治讨论的对象。在此基础上，他们阐发了适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变化了的纲领，它的贯彻不再是依赖抽象的资本逻辑，而是依赖政治力量关系。于是，他们作出了这样的区分：一方面是（作为理想型）私人垄断、激进市场权威和反中央集权；另一方面是中央集权—改革的变种。全球问题的逐步扩大（和平 / 战争、环境）、社会主义前景的绝望，使得必须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解决问题。现在重要的是：“制定纲领和政治行动的精力首先以资本主义内部改革式的改变为目标：另一种经济和社会政治、引入环境友好型的生产与再生产形式、妇女的真正平等和社会所有领域中的民主。”②

在“改革的另外选择”中，“不是涉及与资本主义的断裂，而是涉及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中贯彻以和平为导向和改革开放的发展道路。”③ 因此，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系统中有关民主和社会福利进步的可能性问题得到了肯定的回答，“只有在这条道路上，当今通向广泛的社会福利进步和社会主义的道路才是敞开的。”④ 这种观点是对传统共产主义反垄断导向的批判，J. 胡弗施密特迟些时候更为明确地表述了这种批判。他认为，以前的反垄断纲领是一种还原主义的表达，它想把世界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垄断资本的存在和策略上。⑤ 它忽略了具体的改革，相对于具体的社会问题和社会运动的另外选择，独立化并绝对化了权力问题，“它试图在权力问题已经不是议事日程的时代考虑权力问

---

① Jörg Huffschmid/Heinz Jung, *Reformalternative. Ein marxistisches Plädoyer*. Arbeitsmaterialiendes IMSF28, Frankfurt/Main,1988, S.33.

② Jörg Huffschmid, Reformalternative- Noch ein Abschied von noch einer Illusion? In: Huffschmid/Jung: Reformalternative, Nachdruck von 2010, S.157-173.

③ Jörg Huffschmid/Heinz Jung, *Reformalternative. Ein marxistisches Plädoyer*. Arbeitsmaterialiendes IMSF28, Frankfurt/Main,1988, S.9.

④ Jörg Huffschmid/Heinz Jung, *Reformalternative. Ein marxistisches Plädoyer*. Arbeitsmaterialiendes IMSF28, Frankfurt/Main,1988, S.9.

⑤ Jürgen Reusch/Jörg Goldberg, Reformalternative und Transformationsdebatte, *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 Nr.107,2016, S.42-43.

题。”[①] 沿此思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理论，即相信质的断裂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被推延到了不确定的未来。不过，他们并未放弃这个思想，而是强调他们所勾勒的改革有着独立和继续存在的必要性，不仅是工具功能。

然而，他们所期待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共存并未实现。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资本主义迅速发展以至成为“普遍的和唯一的重要的社会系统”[②]。当时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尝试所带来的希望——资本主义的替代性选择不仅是理论上可以设想的，而且在实践上是存在的和可以贯彻的——迅速失效了。不过，正如 F. 德佩指出的那样，他们所依赖的基本假设，即资本主义将长期处于稳定的阶段能够应付各种挑战，已经很难成立了。自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如下事实已经越来越明显，即资本主义已经过渡到滞胀阶段，并处于多重危机之中。换言之，“自 20 世纪最后 15 年以来，稳定资本主义的措施为资本主义大危机做好了准备，该危机……开创了时代的变革。”[③] 在此背景下，改革与革命的关系问题又被提上议程，它们似乎又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J. 胡弗施密特在反思早期“改革的另外选择”的不足时指出，“马克思主义创新讨论中大部分巨大缺陷和错误发展……，其中就包括该事实，即它对专一性（阶级问题用它规定了传统的思维出发点）的反应是用另一种专一性替代。阶级问题和政治权力斗争被告别了，被类的概念和公民社会话语所取代。”[④]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改革的另外选择”已然无法回答社会主义的替代性选择究竟怎样完成的问题了。

目前，德国左翼党纲领上明确写着：“社会变化的关键问题是所有权问题。经济权力也意味着政治权力。只要大企业的决策是以利润预期而非共同的福祉为导向，那么政治就是压榨的……民主社会要求，必须遏制并克服那些导致贫穷、剥削、破坏自然、军事装备和战争的经济权力……我们欲求民主的彻底革新，它能扩展到经济决策领域中，以及整个所有权形式服从于解放的、福利的

---

① Jörg Huffschmid, *Antimonopolistische Strategie- eine tragfähige Orientierung kommunistischer Politik heute?Vorläufige Thesen*. In: Z1, März,1990, S.78.

② Jörg Huffschmid, Reformalternative- Noch ein Abschied von noch einer Illusion? In: Huffschmid/Jung: *Reformalternative*, Nachdruck von 2010, S.162.

③ Frank Deppe, Reformalternative heute, in: *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 Nr.107,2016, S.37.

④ Frank Deppe, Reformalternative heute, in: *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 Nr.107,2016, S.31-32.

和生态的标准。左翼党“在社会重组的大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为了 21 世纪民主社会主义而战斗”。那么，怎样具体地界定这个“转型过程”？由罗莎·卢森堡基金会资助的“社会分析研究所”开始的“转型研究”就是对该问题的回答。该研究所的前任所长 M. 布里指出，近年来，“转型”概念已经成为左翼政党的“新的元叙事”，它成为“占主导地位的主旋律”，① 也因此备受争议。

“转型”概念与“改革的另外选择”有所联系，又有重大区别。尽管对“转型”概念的具体理解目前尚无定论。M. 布里特别强调，“转型”意味着资本主义内部的一个激进的改革战略，它同时指示超越资本主义，也包括推向社会主义变化的深刻的断裂。他认为，这种转型思想既远离了传统的寄希望于激进的革命断裂，寄希望于“作为消除剥削、压迫、异化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也与系统的适应战略相距甚远。D. 克莱因（Dieter Klein）在“双重转型”概念中阐述了这个基本思想。D. 克莱因认为，转型概念指涉非常不同的社会过程，一方面指涉东欧国家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另一方面指涉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与此相对，一个长期的“第二大转型”应当迈向“与自然协调一致的团结和正义的社会。”② 这种转型也可以被视为“民主的、绿色的社会主义”。不过，这种大转型并非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直接的下一幕剧。下一幕剧或者说很多下一幕剧是资本主义系统内部的许多改革，是诸多小的转型。这个大转型以诸多小转型为前提。后者仍然囿于资本主义之内，这些转型的必然性一方面是源自于近期的世界经济危机，另一方面是源自于自然生活基础遭受的威胁以及对全球能源获取的调整要求，它们迟早要突破并超越资本主义的界限。这两种转型并非是分离的，而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在资本主义内部的转型中，即向社会管制的公民的、绿色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中，能够迈入第二次大转型，在资本主义框架中的转型越加包括了超越资本主义的趋势。这是双重转型构想的基本思想。”③ 因此，这个概念指体系的断裂和内在于资本主义的改变。很明

---

① Brie, Michael（Hrsg.）: *Futuring. Perspektiven der Transformation im Kapitalismus über ihn hinaus*, Münster,2014, S.8.

② Dieter Klein, Doppelte Transformation. In: Brie, Michael（Hrsg.）: *Futuring. Perspektiven der Transformation im Kapitalismus über ihn hinaus*, Münster,2014, S.102.

③ Brie, Michael/ Candeias, Mario/Klein, Dieter: Gegügt es Euch, “im Herrschenden System mitzutanzen, statt es aktiv zu verändern”? Die Transformationsforscher Michael Brie, Mario Candeias und Dieter Klein befragt. In: Michael Brie（Hrsg.）: *Lasst uns über Alternativen reden*. Beiträge zur kritischen Transformationsforschung 3, Hamburg, S.17.

显，这是为了克服传统马克思主义路线中改革与革命的对立。

M. 坎德亚斯（Mario Candeias ）则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首先意指所有社会关系的改变。……不同的社会组织和阶级派别围绕具体的战略方案，在相互争论中形成新的社会集团。”① 在目前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包括已经形成和正在形成的相互竞争的战略方案有四种：（1）独裁的新自由主义和严格的财政紧缩方案，由金融资本和资本集团掌控，它们基本建立在石化能源载体的基础上；（2）绿色资本主义，非石化能源领域的资本集团承载，包括工会和联盟 90/ 绿党；（3）社会—自由的“绿色新政”（Green New Deal）和更多的公共投资和金融市场管制，主要是为了国内市场的资本利益；（4）绿色社会主义，经济民主和“绿色—社会主义再生产经济”，倡导者主体是“马赛克左翼”。这些不是对未来社会应当是怎样的具体情景的展望，而是尝试对经验趋势的规定。不过，M. 赞德（Michael Zander）指出，已有的文献并没有就转型的具体过程展开进一步的经验分析，而且怎样利用数据库和统计方法去识别这个转型趋势也未得到相应的澄清。K. 施泰尼茨也指出，在转型分析中，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后果得到了充分地论述，但“这些后果出现方面的概率并没有得到充分地评估。”②

除了对转型概念、转型过程的分析外，罗莎·卢森堡基金会的转型研究还从政治和社会学方面回答了应当怎样去贯彻左翼所希望的转型。一些学者认为传统的阶级概念不再适用，因为传统的产业工业工人队伍不断地萎缩，已经无法充当转型的主体，在当今“缺少一个明确固定的转型的主体”③。“当今的转型只能作为劳动、经济、科学、公共领域和政治的多元社会和政治力量的合作行动才是可设想的。”④ 但对具体的合作模式，德国左翼学者也存在着一定的分歧。D. 克莱因援引了“马赛克左翼”概念，就像马赛克由诸多部分组成一样，转型的主体应当由诸多不同的群体和组织构成，进而形成完全不同的统一

---

① Candeias 2014，304f，Szenarien greener Transformation. In M. Brie（Hrsg.），Futuring, Muenster.

② Steinitz，K.：Überlegungenzueinerkritischenlinken Transformationsforschung. In M.Brie（Hrsg.），Lasst uns uber Alternativen redden. Hamburg, 2015.

③ Rolf Reißig: Tranformation—ein spezifischer Typ sozialen Wandels. Ein analytischer und sozialtheoretischer Entwurf. In: Michael Brie（Hrsg.）: Futuring, Münster, S.82.

④ Rolf Reißig: Tranformation—ein spezifischer Typ sozialen Wandels. Ein analytischer und sozialtheoretischer Entwurf. In: Michael Brie（Hrsg.）: Futuring, Münster, S.82.

整体。该整体“除了工会之外，还包括全球批判运动、广泛的非政府组织、各种不同的社会自我救助组织，尤其是文化左翼中的批判人士，即科学家、学者和其他人”，他们“相互包容和相互接受的新文化”，必须“是这种联盟的关键资源”。“马赛克左翼”虽然描述了一种新的合作模式，但它与其他政党的界限却并没有得到充分地阐述。此外，在合作方面，D. 克莱因希望通过“红—红—绿联盟”（即社会民主党、左翼党、绿党联盟）改变社会力量关系，以朝向左翼方向发展，但是社会民主党和绿党为什么要改变自身，这种改变的动力来自何处？ D. 克莱因并未阐述清楚。

另外一些学者如 M. 布里和 C. 希尔德布兰特（Cornelia Hildebrandt）则仍然强调阶级分析的必要性，特别反对 M. 维斯特（Michael Vester）的劳动组阶层理论。他们认为，即使工人之间也存在一定“水平差异”，“一部分成功地提高了收入、教育、地位和社会保障，他们拥有受全球欢迎的技能，工作在繁荣的德国出口工业核心领域，或者工作在更高的公共服务领域。而另外一些人则为提高工资和工作条件、为微薄的社会福利而斗争……还有一部分则是服务业无产阶级。”① 不关注这些，人们会错失系统的社会和阶级结构分析。M. 布里和 C. 希尔德布兰特指出，现在的大部分左翼来自于社会中产阶层，因此要训练“来自底层的眼光”才能联合社会底层。在选举中，社会底层往往弃权或者选举所谓的右翼政党，而中产阶层在政治上也是不可靠的，他们往往会选择自由民主党、德国的另一种选择党和绿党。然而，令人惊奇的是，左翼政党很少出现在转型研究的文献中，而已有政党政治的选择显得颇为有限。K. 基平（Katja Kipping）和 B. 利辛格尔（Bernd Riexinger）谈论了“所有红绿联盟观念的最终失败，即在现存框架中的整容式改变”，社会民主党和绿党“与之前相比已经远离了社会正义，这些政党中再也没有左翼阵营了”②。他们一方面寄希望于有待新创造的“团结阵营”，另一方面寄希望于“SPD 和绿党的基本的方向转变”。

除了这些政治实践层面的讨论之外，“转型研究”有待展开的还有哲学层

---

① Brie, M./ Hildebrandt, C.: Solidarische Mitte-Unten-Bündnisse.Luxemburg 2/2015, http://www.zeitschrift-luxemburg.de/solidarische-mitte-unten-buendnisse/.

② Kipping, K./Riexinger, B.: Revolution für soziale Gerechtigkeitund Demokratie! https://www.die-linke.de/nc/die-linke/nachrichten/detail/artikel/revolution-fuer-soziale-gerechtigkeit-und-demokratie/.

面的探索，因为“对转型展开辩论的焦点在于强调渐进式改革，并假定它具有导向深远改革的潜能”[①]。能否从哲学层面上阐明这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可能直接决定转型研究的成败。

五、资本主义危机诊断与社会主义构想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重新成为热点。它已超出学院派狭小的圈子，成为媒体报道、公众讲坛的主题，甚至成为街谈巷议的主题。与此相应，对未来社会的构想也成为学界、左翼政党讨论的热点话题之一。在 2016 年德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有关这两个方面的代表性著作有：《没有贪婪的财富：我们如何脱离资本主义》[②]、《资本主义将如何终结?》[③]、《21 世纪社会主义趋势》[④]。这些著作不仅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支撑，而且也充分利用了当今的实证研究数据，并且它们的语言表达简明流畅，具有广泛的可读性，已在学界和公众中引起了一定的反响。

《没有贪婪的财富：我们如何脱离资本主义》的作者 S. 瓦根克内希特（Sahra Wagenknecht），曾是德国左翼党（die Linke）主席。该书指出，就如我们在 21 世纪经历的市场资本主义仅仅是以利润为导向的，它的参与者们对财富贪得无厌、具有无限的破坏力，因此这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应当被废除。该书想要说服所有那些在当今占支配地位的经济和政治系统中并未受益反而受害的人们，但这并非易事。因为对资本主义的如下辩护已被大部分人所接受：资本主义在过去的发展中已经证明，它能够创造巨大的财富，所有的阶层最终都能从中获益，它在将来也会继续如此。这种观念在大众中已经根深蒂固，甚至造成了许多人放弃去反思当今社会体制的意义了。[⑤] 与此观念相反，作者认为这完全是

---

① 乌尔里希·布兰德:《作为一种新批判性教条的“转型”》，刘琦编译，《国外理论动态》2016 年第 11 期。

② Sahra Wagenknecht, *Reichtum ohne Gier. Wie wir uns vor dem Kapitalismus retten*, Campus Verlag, Frankfurt/New York, 2016.

③ Wolfgang Streeck, *How Will Capitalism End? Essays on a Failing System*，Verso，2016.

④ Mimmo Porcaro. *Tendenzen des Sozialismus im 21. Jahrhundert*. Beitraege zur kritischen Transformationsforschung Bd.4, VSA, Hamburg, 2015.

⑤ Sahra Wagenknecht, *Reichtum ohne Gier. Wie wir uns vor dem Kapitalismus retten*, Campus Verlag, Frankfurt/New York, 2016，S.141.

一种假象。建立在对世界经济体制的数据材料分析和许多著名的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所提出的命题的基础上，S. 瓦根克内希特强调："下述承诺是空洞不可信的，即 20 世纪后半叶资本主义盛行的主要原因可归功于它的繁荣承诺。个人是否能够在收入和财产的金字塔顶端谋得一块令人向往的一隅之地，已经远不是由能力和自身的努力所决定的，而是仍然由出身决定。"① 她把这种关系表述为"经济封建主义"，该书的大部分内容就是对这种关系的进一步分析。这种关系在当今资本主义的发展中越来越显露出来，如下的问题就越来越紧迫：为了将来更好地生活，我们当今仍需资本主义吗？或者正是这种经济形式阻碍了我们对更好生活的追求？人们真得必须依赖利润动机的刺激，才能改善技术以至于技术生产才能不再毁坏我们的地球和我们的生活基础吗？或者恰恰相反，正是利润导向的增长逻辑束缚了我们的双手？ ②S. 瓦根克内希特主张，资本主义对于科技进步和社会福利并非是必要的，它理应被废除。必要的不如说是从当今资本主义到未来能惠及所有人的社会转型。

当然，她同时也强调不能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资本主义所有制必须被废除，但是应当保留市场经济结构，因为"当大量需求方竞争稀缺资源，并且有许多供货方提供产品时，市场是一种能产生有效分配的技术"③ 。这种建立在市场基础上并能走向有动力的创新型经济的、同时提高所有人的福利并能保障生态环境的所有制形式是什么呢？这种替代性的所有制形式是该书最后一章分析的重点。S. 瓦根克内希特介绍了四种基本的企业类型：合伙企业、合作企业、公共企业、公共福利企业。这四种企业类型并非需要人们新创造出来，有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得到了部分发展或尚未实现发展。这四种企业类型背后共同的理念是：企业的发展必须被置于共同决定的框架中。在公司的政策中，每个职员都可以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在发展市场空白、改善现有产品和试验新想法等方面，它们的民主结构使得充分利用社会的创造性潜力成为可能。S. 瓦根克内希特认为，这样的成就"没有任何其他的机制能够很好地动员达到，

---

① Sahra Wagenknecht, *Reichtum ohne Gier. Wie wir uns vor dem Kapitalismus retten*, Campus Verlag, Frankfurt/New York, 2016，S.12.

② Sahra Wagenknecht,*Reichtum ohne Gier. Wie wir uns vor dem Kapitalismus retten*, Campus Verlag, Frankfurt/New York, 2016，S.19.

③ Sahra Wagenknecht, *Reichtum ohne Gier. Wie wir uns vor dem Kapitalismus retten*, Campus Verlag, Frankfurt/New York, 2016，S.108.

只有许多生产者自由地竞争和对新进入者的持续市场开放”才能达到。[①] 这种替代性经济是一种小型的、地区的和民族的生产的统一体。企业的未来也不是全球性的寡头垄断的集团，不是国家集权的经济政治。由此，作者基本勾勒了自己对当今资本主义向未来社会秩序转型的理解。

W. 施特雷克，曾是马克斯·普朗克社会学研究所所长，2014 年出版了《被购买的时间：民主资本主义延迟的危机》[②]，在德国学术界和公众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2016 年，他再次出版论文集《资本主义将如何终结?》，其中多篇文章的观点已引起了广泛影响。例如，作为书名的第一篇论文曾以德文发表于 2015 年，它的出版立即引起广泛关注。为此，北威州罗萨卢森堡基金会、社会科学高校社团、莱茵地区社会主义论坛，邀请 W. 施特雷克与 S. 瓦根克内希特二人，于 2016 年 1 月 27 日在科隆大学，围绕“资本主义走向终结了吗?”展开学术对话。超过主办方的预料，容纳 500 人的阶梯大教室竟然无法容纳前来倾听的观众，主办方不得不拒绝超出数百人入内。下面将简要介绍 W. 施特雷克的主要观点。

1. 资本主义危机的三大特征。资本主义如今处于关键情形之下：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德国结束了战后的宽松政策，开启了漫长时期的政治和经济失序，最新的表现是 2008 年的经济危机。连续性的严重危机前所未有，通过全球经济的相互联系，它传播得更加广泛与迅速。危机的特征突出呈现在三个方面：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总体债务不断上升；经济不平等。W. 施特雷克指出，资本主义经济获得其所需要的合法性前提条件，主要源自于稳定的经济增长、健全的通货和些许的社会公平，即将资本主义的收益部分地转移到那些没有资本的人手中。从此视角来看，最使人感到警惕的是上述危机的三个趋势可能增强。大量的证据表明，日益增长的不平等是经济增长衰落的原因之一，不平等既会阻碍生产的进步又会削弱消费需求；低增长反过来又会通过分配冲突加剧而恶化不平等，使得富人对穷人让步的成本更加高昂，而且他们会前所未有地强调严格遵守管理自由市场的马太效应。然而，这个看起来是不良趋势的恶性循环会一直继续下去吗？是否存在可以打破这一循环的反

---

① Sahra Wagenknecht, *Reichtum ohne Gier. Wie wir uns vor dem Kapitalismus retten*, Campus Verlag, Frankfurt/New York, 2016, S.161.

② Wolfgang, Streeck, Gekaufte Zeit, Die vertagte Krisedes demokratischen Kapitalismus. Berlin : Suhrkamp, 2013.

作用力？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资本主义危机并非是新东西，事实上为了长期的健康状态，危机是必要的。他们所讨论的是周期运动或随机冲击，在这之后资本主义经济可以迈向一个新的均衡。但如今状况则是一个逐渐衰落的持续进程，而且当今前所未有的低增长、高度不平等和日益上升的债务并不一定是可持续的，综合起来会诱发体系层面的危机。

2. 资本主义与民主渐行渐远。资本主义和民主长期被视作是敌对的，只有在冷战时期，资本主义和民主似乎是相互联合的，因为经济进步使得作为大多数的工人阶级接受了自由市场和私有产权机制，这反过来使得民主自由与市场和获得利润不可分离，甚至前者依赖于后者的存在。然而，对资本主义经济和民主政体相容性的怀疑再次回归。在政治上，普遍的感觉是政治并不能在生活中产生作用，政治被视为陷入僵局、无能和腐败，一群自我封闭和服务自我的政治阶层统一地宣称对他们和他们的政策没有替代方案的存在。结果是：日益减少的选举投票率和选民波动、平民主义反抗政党的出现和普遍的政府不稳定。① 从经济上看，近十几年新自由主义主导了各国经济政策的制定，它主张增长是源自于市场不受到再分配的政治扭曲的影响。制度保护市场经济免于民主的干预大幅度提升，贸易工会在很多国家减少甚至被废除。在欧洲，诸如制定工资和财政的国家经济政策被一些跨国机构管理，这有效地带来欧洲资本主义的去民主化。② 精英也对民主政府及其是否能根据市场要求重新塑造社会的合适性产生怀疑。就当前而言，新自由主义主流的政治乌托邦是“符合市场的民主”，即没有纠正市场的权力和支持从底层到高层的与动机相融合的再分配。精英对平民民主施加压力，实现经济的中立化有增无减，在欧洲这表现为政治经济决策权继续进行重新配置，即转移到一些诸如欧洲银行和政府领导人首脑会议的跨国制度。③

3. 资本主义成为自身的敌人。为了确定资本主义是否仍能存活，作者将其界定为现代社会，该社会再生产的获得仅仅是个体为了追求资本和利润最大

---

① Wolfgang Streeck, *How Will Capitalism End? Essays on a Failing System*. London & New York, 2016, p.52.

② Wolfgang Streeck, *How Will Capitalism End? Essays on a Failing System*. London & New York, 2016, pp.53-55.

③ Wolfgang Streeck, *How Will Capitalism End? Essays on a Failing System*. London & New York, 2016, pp.55-56.

化的非预期的副效应，是通过劳动进程将私有的资本和商品化的劳动力结合来完成曼德费尔原则，即将个人的恶转变为公共的收益。正是在此意义上，作者认为当代资本主义不能被继续维持。随着资本主义衰落进程，必然会激起政治抗议和集体干预的多重尝试。那么为什么资本主义在不再有什么反对派的情形下会处于危机中？作者的回答是没有反对派事实上对资本主义有害无益。内部的多样性和组织原则的多元性会带来社会体系的兴盛。资本主义也从反对利润和市场的运动中获益。在凯恩斯主义和福特主义中，资本主义或多或少的忠诚的反对派确保并稳定了总体的需求，尤其是在衰退时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挫败反对派或许事实上是惨胜（Pyrrhic Victory），因为那些反对力量虽然有时造成不便，但事实上却支撑了资本主义。①

胜利的资本主义可以成为自己糟糕的敌人吗？为了探讨这一可能性，作者转向了波兰尼关于市场扩张的社会限制的观念，它基于三种虚拟商品概念之上：劳工、土地（或自然）和货币。虚拟商品被界定为这样一种资源，在其中供给规律只能部分和尴尬地适用。虚拟商品只能在十分限定的条件下被视作商品，因为完全的商品化会摧毁它或者使它去稳定性。然而，市场的本质倾向是超越其原有的领域，即物质商品的交换，扩展到其他的生活领域，无论这些领域是否适合商品化。除非受到约束性制度的控制，市场的扩张处于抑制和削弱自身的永久风险之中，并且顺带削弱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体系。② W. 施特雷克指出，事实上，如今的市场扩张都已经达到关键性的门槛，保护上述三种领域免于市场化的制度性保护已经在诸多方面被腐蚀。例如，带来 2008 年全球经济衰退的是货币的过度商品化。就自然而言，无限扩张的资本主义原则和自然资源的有限供给之间存在紧张关系。就劳工的商品化而言，已经达到了一个关键点，国际竞争下的劳工市场的去管制已经取消了通常对工作时间的限制，就业对人口日益增多的一部分而言是危险的。工作渗透到家庭压力中，劳工市场的压力使得人力资本需要不断提升，全球流动性使得雇主可以随时更换不顺从的地方劳工，转而雇佣顺从的移民。阶级和社会团结降低和相应地围绕着族群多样性的政治冲突使得社会反抗运动不断削弱，即使在传统的自由国

① Wolfgang Streeck, *How Will Capitalism End? Essays on a Failing System*. London & New York, 2016, pp.60-61.

② Wolfgang Streeck, *How Will Capitalism End? Essays on a Failing System*. London & New York, 2016, p.61.

家，诸如荷兰、瑞典和挪威也是如此。[①] 就虚拟商品而言，资本积累或许已到极限。在表面上，商品和服务的消费继续增长，但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已经与物质需求本身脱离，如今的消费并不在于使用物品本身的价值，而是它们的象征价值，这也是为什么需要花费大量资金去进行营销、产品设计等。[②]

4. 资本主义五大系统性失序。资本主义由于摧毁了自身的反对派而正在走向终结。为了解释该过程，W. 施特雷克指出了当今先进资本主义的五大系统性失序，它们都源于资本主义传统制度和政治限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被削弱了。它们分别是：停滞；寡头性再分配；掠夺公共领域；腐败；全球无政府状态。（1）当前的停滞理论十分接近 20 世纪 70—80 年代的新马克思主义的消费不足理论。就像凯恩斯指出的那样，收入集中在顶层会减损有效需求，会刺激资本的拥有者在实体经济以外寻求投机性的利润机会。这事实上也或许是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资本主义金融化的原因之一。对资本家和它的维持者来说，低增长将会使他们没有额外资源去解决分配冲突和缓和不满。随着增长衰落和风险增加，生存斗争将会变得更加艰巨。然而，目前并没有试图恢复对商品化的保护性限制，这些限制因为全球化而已经变得过时，如今人们探讨的新方式是掠夺自然、延长工作时间、鼓励所谓的创造性金融，以试图维持利润的增加和资本积累的继续。[③]（2）并没有迹象表明，朝向更大经济不平等的长期趋势在何时会被打破。不平等会压低增长，但当下中央银行为了恢复增长所提供的“来的容易的货币”（easy money）（对资本来说来的容易，但是对劳工来说并非如此）只会进一步加剧不平等，因为它会扩大金融领域并带来投机性而非生产性的投资。再分配到顶层因而成为寡头性的，不是服务于经济进步的集体利益。（3）通过资金不足和私有化来掠夺公共领域。这体现为双重转移，即从税收国家到债务国家，最后到紧缩国家。转移的原因首先在于全球资本市场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的为偷税等提供的可能性。甚至在 2008 年之前，通过降低支出而不是提高税收来解决财政危机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寡头经济与普通

---

① Wolfgang Streeck, *How Will Capitalism End? Essays on a Failing System*. London & New York, 2016, pp.62-63.

② Wolfgang Streeck, *How Will Capitalism End? Essays on a Failing System*. London & New York, 2016, pp.64-65.

③ Wolfgang Streeck, *How Will Capitalism End? Essays on a Failing System*. London & New York, 2016, pp.65-67.

人相脱离，富人不再被预期需要为以穷人为代价的最大化财富获取进行补偿。这就是马克思所描述的根本张力：现今经济社会中生产的社会性质与生产手段私有性质的对立。（4）腐败是当代资本主义的第四个失序。[①]（5）最后一个失序是全球无政府。全球资本主义需要一个中心可以控制边缘，并提供可靠的货币机制。在 1920 年之前，英国扮演了该角色，随后美国在 20 世纪 30—70 年代接过了这一角色。然而，当代资本主义世界已经步入无政府阶段，美国已经不能维持战后的角色，多极世界秩序正在形成。

在《21 世纪社会主义趋势》一书中，M. 波卡罗（Mimmo Porcaro）坚持认为，对社会主义理解的根基必须奠定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再生产条件之上。不过，作者关于社会主义的主张与 H. 迪特里希不同，社会主义并非仅仅代表了一种“等价经济”（Äquivalenzökonomie）；也与哈特和奈格里的主张不同，他并不主张要告别民族国家和传统的国家与人民主权观念；显然也不同于霍耐特的“社会主义理念”——与霍耐特主张社会主义理念是对法国大革命理念中内在矛盾的克服不同——M. 波卡罗认为社会主义首先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克服。他论述的出发点是：生产的社会化形式与占有的私人形式之间的基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关系。总的说来，本书的核心是尝试分析当今社会组织的矛盾，并在此基础上展示社会主义介入的出发点。

虽然 M. 波卡罗较多地把社会主义问题转移到了经济领域，但他也反对这个立场，即把市场组织原则教条地解释为社会秩序的无所不在的支架，“以我的理解来看，共产主义是政治运动，它的目的在于尽可能地扩大合作式的共同劳动。社会主义是一个社会系统，它在历史发展的可能的形式中实现这种合作。”[②] 社会主义将在原则上作为资本主义的替代者被引入，但它只有参与当今实际的资本主义论争才能在政治上发挥作用。伴随着竞争的加剧，M. 波卡罗把垄断寡头的资本增长理解成“无中央集权的集中”。[③] 因为当今资本主义的发展

---

① Wolfgang Streeck, *How Will Capitalism End? Essays on a Failing System.* London & New York,2016, pp.69-70.

② Mimmo Porcaro. *Tendenzen des Sozialismus im 21. Jahrhundert*. Beitraege zur kritischen Transformationsforschung Bd.4, VSA, Hamburg，2015, S.22.

③ Mimmo Porcaro. *Tendenzen des Sozialismus im 21. Jahrhundert*. Beitraege zur kritischen Transformationsforschung Bd.4, VSA, Hamburg，2015, S.23ff.

并未沿着通过直接组织的方式，把整个创造价值的企业链条置于一个有组织的中央集权式的大企业之下，而是借助于“市场与网络机制”来调节大企业与小企业之间的关系。作者强调，这种策略绝不是寡头政治权力的丧失，而仅仅是它的“形式转化”。与之相应，有三个关键的方面可以回答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工业利润的降低，即金融化、生产过程的碎片化和全球化。此外，从这三个过程出发，作者还强调了“无市场的商品化”趋势，即在解释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竞争和价格形成机制时，新古典主义市场模型的失灵。当然，不论是对市场失灵的“左翼自由主义”分析的变种，还是波兰尼所阐述的市场活动的“嵌入”（Einbettung）与“去嵌入”的二元对立，对于社会主义来说，批判市场绝对是不够的。作者认为，要更多地根据马克思的论述，把市场视为“资本的形态变化”，因此要把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和建立于其上的社会关系当作批判的中心。“仅仅把市场重新置入社会的控制之下是不够的，还要将社会建立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之上，并主要建立在对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和雇佣劳动的基础之上”；社会主义的策略是“计划生产和对最重要资源的使用，……把寡头之间深藏的政治斗争转化为一种透明的政治—经济关系、当作公共讨论的对象”①。

这种时代诊断至少暗含了对政治地位的突出强调，不过 M. 波卡罗在之后的论证过程中也指出，在危机时主张“重返国家”是走入歧途的做法。虽然在经济繁荣时期，国家的压迫功能退居在貌似前政治的交换关系之后；但在经济危机时期，为了“a）镇压或者中立化阶级斗争，b）使用那些为资本积累服务的社会财富（体现为税收），c）在具体区域中准备为资本发展所必需的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首先是科学），d）管理公共货币体系并保障私人货币……”，国家的压迫功能会在“与暴力垄断相关联的国家公共领域和领土范围”内被使用。尽管如此，人们不得不承认在新自由主义时期，传统的国家功能被进一步私有化，特别是“统治向治理的部分转型”，作为对“有约束力的法律”的替代，合同和软规范在私有化传统国家功能的策略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作者也指出，这种自我组织的管理结构在社会主义情境中可以成为“反映社会需求的宝贵的信息来源，并可成为未来规划的关键资源。”②

---

① Mimmo Porcaro. *Tendenzen des Sozialismus im 21. Jahrhundert*. Beitraege zur kritischen Transformationsforschung Bd.4, VSA, Hamburg，2015, S.41.

② Mimmo Porcaro. *Tendenzen des Sozialismus im 21. Jahrhundert*. Beitraege zur kritischen Transformationsforschung Bd.4, VSA, Hamburg，2015, S.61.

在 D. 萨洛蒙（David Salomon）看来，作者在该书中对待全球化的态度是值得商榷的。[①] M. 波卡罗在该书中指出全球化并非不可逆转。“当商品运输和分散成本下降比生产成本要快时”，它是“可能的并且是有益的”；但是当其他的空间解决方式，如建立广阔的大陆生产空间也能够带来相似的经济利益，并且能够降低全球化生产的不安全性时，那么全球化就能变为一种倒退的发展。[②] 一般认为的“全球化”不是“完全的全球化”，因为国外直接投资的增长和超越民族国家空间的跨国集团，首先涉及的是北美、欧洲和日本。全球化也没有走向克服民族国家之路，而是在国家之间新的等级秩序中促进某些民族国家脱颖而出。作者描述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竞争所存在的完全阴暗的画面，在其中就包含资本主义国家和一种新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之间日益增长的竞争。在此，作者虽然区分了社会主义与国家资本主义，但是认为社会主义运动与国家资本主义的合作是可能的。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① David Salomon, Sozialismusund Gegenwartskapitalismus, *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 Nr.107,2016, S.216.

② Mimmo Porcaro. *Tendenzen des Sozialismus im 21. Jahrhundert*. Beitraege zur kritischen Transformationsforschung Bd.4, VSA, Hamburg，2015, S.62ff.